

人说 我像赵忠祥

石湾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人说我像赵忠祥

石 湾 著

（京）新登字13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说我象赵忠祥/石湾著.-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8

ISBN 7-5071-0228-9

I.人… II.石… III.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1267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管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5

字数：90千字 印数 1-1200册

定价：4.00元



作者小传

石湾，本名严儒铨，1941年生于江南农家。1964年8月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文化部艺术局、《新观察》杂志社、《中国作家》编辑部从事戏剧创作和文学编辑工作，陆续出版有《鲜红的领巾》、《春光属于你》、《维纳斯的诞生》、《无花果》、《丽人行》、《中国出了个童话大王》等著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出版社编审、《作家文摘》执行副主编。

目 录

人说我像赵忠祥·····	(1)
故乡的光荣·····	(4)
失聪记·····	(8)
我的后头娘·····	(16)
最深最久的记忆·····	(24)
情债·····	(34)
在智慧鸟飞来的时候·····	(39)
洗衣有瘾·····	(46)
看重晚餐·····	(49)
掌勺协定·····	(52)
“蝴蝶”贺卡·····	(55)
美中不足·····	(58)
父女情深·····	(61)
省心家长·····	(64)
灾祸面前·····	(67)
换床之喜·····	(70)
难忘家庆·····	(73)
生日的福份·····	(76)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邓颖超同志喜欢的一首诗·····	(80)
冲破你的择偶圈·····	(86)

情到深处当无话可说	(89)
爱,正在成长	(92)
温馨的楼群	(95)
门外谈门	(97)
“青松岭”的变迁	(100)
想起了编辑的责任	(103)
我与《棋王》	(106)
美的发现与呐喊	(110)
《阳光下的迷惘》序	(113)
莫给名家改姓名	(116)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118)
刹住投稿中的不正之风	(122)
成功者的启示	(125)
仓促之间	(131)
答谢	(136)
后记	(142)

人说我像赵忠祥

有朋自南方来，说三九胃泰的电视广告，厂家在事先曾作出决定，必须请一男的、在国内最有影响的、年长的影视演员来做。第一号种子选手便是赵忠祥。后因中央电视台有规定，节目主持人一律不得参加广告拍摄，南方制药厂才选用了李默然，继而是刘文治。李默然和刘文治都够大名鼎鼎的了，可是毕竟比不上赵忠祥。随着电视的普及，从播“新闻联播”节目开始，赵忠祥已活跃在屏幕上一二十年，真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影视是可以找替身的。”朋友们当场逗我，“这广告怎么不请石湾去拍呢？拍完之后，至多请赵忠祥配一下音，绝对可以乱真！”……

我曾经听人讲过，美国曾搞过一次模仿卓别林表演的大选赛，最后让几位优胜者与卓别林一起出场表演，结果真卓别林反而落选了。人说我像赵忠祥，虽然没有乱真到如此地步，但也确实曾多次引出乐子来。

记得是1983年春，那时我在一家杂志社当记者，到中央某部委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刚进会场，就有两位陌生的朋友迎上前来，热情握手之际，关切地问：“啊呀，老赵！几个月没

见，怎么你瘦了许多？”后来，我才知道，会议是请了中央电视台来拍“新闻联播”节目的，并说赵忠祥也可能来。所以，在我未到场之前，他们早就翘首以待了。

还有一次，是1988年秋，我与几位北京作家一起在仪征化纤公司采写报告文学，星期天，主人陪我们到扬州游览，中午在一家驰名中外的茶社就餐。因事先没有预约，到得又晚了些，几种最富特色的包子已告售罄。起始，几位首次下扬州的同伴不免有些懊悔，不该在瘦西湖徜徉久了，误了这难得的口福。但坐定之后，我们渴望吃到的名点系列，竟各式俱全。“方才不是说花色不全了，怎么忽儿又有了呢？”我们问服务员。服务员冲我神秘地笑了笑，回答说：“你们是北京来的稀客，好难得的。我们把留着供应外宾的那份，给你们上了。”服务员退下之后，文联出版公司机敏透了的小詹悄悄对我说：“他们准把你当成赵忠祥了。”

我一直未得机缘与赵忠祥碰面。1989年9月，我应邀去大连参加首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北京站上车，进卧辅车厢，刚找到我的铺位，对面下铺上一位年轻的美髯公就向我打招呼：“老赵，你也去大连参加民间艺术节吗？”我忙着向行李架上放提箱，没顾得上与他搭话，只是回眸一笑。坐定之后，忙消除误会，交换名片，方知美髯公是“正大综艺”节目的编导赵安，还有摄像师刘文山和两位搞灯光的师傅……看过我的名片，他们还不停地端详我，说：“真像，真像老赵。”以往，我只是唬住了一般的电视观众，而此刻，竟蒙住了中央电视台与赵忠祥共事多年的编导和摄像师，这是很意外的。如果说“乱真”，这一回该达到“乱真”的水平了。

我每次外出，结识新朋友，常有这般情景：“我发现，你像

一个人。”这时，在场的人就会异口同声地说：“赵忠祥！”老实说，久而久之，这话我听得都有些腻味了。

但也有颇令我快慰的。一次是我到中纪委招待所去看望在那里下榻的山东作家张炜。张炜说：“这次来北京闹了个笑话，我把赵忠祥当成你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说：“前些天，赵忠祥也住在这里，录知识大奖赛节目。在食堂排队买饭，他排在前面，我以为是你，上去打招呼。他哪认识我是谁呀？”……另一次是肖复兴告诉我的，讲在一次晚会上，赵丽宏找到他说：“方才我见到石湾，跟他握手，他怎么一副不爱搭理人的样子？以前见面，他总是蛮热情的。我没得罪他，他对我怎么变得这么冷淡？”肖复兴说：“不至于吧！石湾在哪？我怎么没见着？”赵丽宏用手一指：“那不是吗？”肖复兴扭头一望，“哈哈”笑了：“唉！那不是石湾，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

人与人相像，就应该是双向的。总有人说我像赵忠祥，而没有人说赵忠祥像我，我就感到心理失衡。尤其是还要沾点赵忠祥大名的光，失却自我价值，就更感到不是滋味儿。因此，每遇有朋友说我像赵忠祥时，我常这样回答：十几年前，有彩电的人家极少，当时我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里住，每天晚上，大伙都挤在排演厅里看公家的彩电，当有邻居对我女儿说“你爸爸像赵忠祥”时，我女儿很有些生气的样子，认真地纠正说：“不，是赵忠祥像我爸！”她当时不过五六岁，还没上小学呢！

……

知父者莫如爱女，信然。

1991年10月25日

故乡的光荣

每个人都有他出生和儿时生长的地方。可以说，“故乡”二字，对于少小离家的人来说，总是格外亲切的。我自十四岁到苏州读高中开始，就在常州搭车，离开故乡武进了。二十多年来，我在外学习、工作，是时常思念着故乡的；不只思念，也时常为生我养我的故乡感到自豪。

记得在“文革”之前，每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在回答“武进——也就是常州”之后，总还要用颇有些骄傲的语气补充说：“和瞿秋白同乡。”是的，对于在红旗下长大的我来说，我是从小把瞿秋白当成故乡的光荣的。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爱好文艺，练习写诗、朗诵。我爱秋白的诗，他的《赤潮曲》是我最喜欢的朗诵诗。虽说在我出生的时候，秋白同志早就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了，但，我总觉得他是和我很亲很亲的一位故乡的长辈。

十年内乱开始之后，严格地说，还要早一些，是戚本禹的那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出笼之后，再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在回答“武进——也就是常州”之后，就再也不补充说“和瞿秋白同乡”了。但是，在那什么都要“株连九族”的年代，不免会遇到专爱“揭老底”的人，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说：“知道

了，叛徒的故乡。”——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刻，我总有一种受了冤屈的感觉，一种为故乡抱不平的情感。到后来，为了少生这份气，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就只笼统地回答“江南”了。因为“江南”二字，从来是被人所称颂的。那年月，歌曲和诗词里常出现“××如今赛江南”一类句子，但毕竟还承认过去是不如江南的。

对于单凭一篇《多余的话》，就把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的秋白打成叛徒的做法，在我心里，一直是不服的。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经历了八九年动乱的祖国大地，也好像透出了一点早春的气息。那时，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出差到上海去，当车过丹阳，进入武进地界之后，我自关不住一腔乡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窗外故乡的每座村庄、每一条河渠、每一垅麦苗了！车还未在常州站停稳，就有同事说：“嗨，你的故乡到了！怎么样，瞿秋白的故居被砸掉了没有？”秋白的故居是否被砸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回故乡看过。但，这完全是可想而知的。我脱口回答说：“哪还能幸免！”结果，没想到这位同事悄声告诉我：“砸掉了，说不定还会重修！”

我大吃一惊：“怎么，你有什么‘尖端’消息？”

“有。听说毛主席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时，找到瞿秋白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什么也没说，走了。”同事在传播这条‘尖端’消息时，表情是既神秘而又十分严肃的。

这是真事吗？我半信半疑。但作为秋白的同乡，我但愿这事是真的。

也许就是因为是秋白同乡的缘故，我总也忘不了这个车过故乡时听到的消息。每想起这事儿，我也总是去把它加以合理：毛主席不是说过，他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吗？而鲁迅和秋

白是最亲密的战友、“知己”呀！毛主席的心为什么不可以与秋白相通呢？呵，毛主席在秋白墓前鞠躬，一定是真的，真的！

.....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1978年的早春，我到八宝山去参加一位老同志的平反追悼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八宝山。我早早就到了。一进门，就向人打听瞿秋白的墓在什么地方。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就在任弼时同志墓的旁边，从东数起，他是第一个。是呀，按照在党史上的地位，秋白的墓排在第一个，是当之无愧的。结果，我找到秋白的墓地一看，那里空荡荡的，别说墓碑，连墓砖也不见有一块。我想，他的忠魂兴许还在吧，地上的人冤屈了他，他长眠在地下的战友们总还了解他吧？不知为什么，我在他墓地伫立了良久之，又想起了车过故乡时听说的那件事儿。我虽不能证实像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革命家是否在他墓前鞠躬，但我，作为来自他故乡的一个晚生后辈，此时此刻，却情不自禁地在他墓地向他的忠魂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含泪告别他的墓地时，四周的迎春花尚未开放，但我坚信，这花，迟早会开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0年6月17日，我得到一张《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座谈会》的请柬。那天，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心情特别激动。在西大厅会议室门前签到时，提起毛笔，手都有些颤抖。我仿佛觉得，是故乡的亲人们委托我来参加座谈和纪念秋白、学习秋白的。会上，谭震林、茅盾、李维汉、周扬、袁任远、曹瑛、于光远等革命前辈讲了话。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谭震林同志传达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秋白同志的高度评价。这使我联想起周扬同志说过的话：“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挑起过革命实

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

秋白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故乡的名誉也随之恢复了!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听着首长和前辈们的讲话,我的心仿佛飞回了故乡。我真想大声地说:故乡的亲人哪!你们听见了么?听见我们的党中央对秋白同志的高度的评价了么?

.....

从那次纪念座谈会后,凡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又这样自豪地回答了:“武进——也就是常州……和瞿秋白同乡。”

呵,故乡,我光荣的故乡,骄傲的故乡!此刻,我怎能不向您倾吐深情的思念?!

1981年5月4日写于北京

失 聪 记

记得是 1986 年秋，在广州东湖宾馆，一家杂志举办的笔会结束之际，结识仅数日的文友们行将分手，相互间还有许多话题未得展开，便要各奔东西了。今后，当然还会有碰面的机会，但要让所有与会的朋友都重聚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了。兴许，个别朋友，就只此一面之缘。

返程票是预订的，有坐火车地上走，有搭航班天上飞，线路各异，时有早晚。这时，各自收拾好行李，都汇聚在一个大套间里，后走的送先行的，送了一批又一批。就在这不断送行的间隙，好几个朋友缠着上海女作家周玉明，虔诚地请她看手相。仿佛错过了这次机会，便将铸成终身遗憾。

看手相是很费脑子的。草草看过几个自动排号者后，已感疲惫的周玉明说：“其实，这次笔会上，经我观察，只对两位朋友的手相感兴趣。第一是柯兰，第二是石湾。”她先给出身、经历都相当特殊的柯兰看了，柯兰说：“很准”。《天津文学》的柯兰是笔会上公认的一位以诚待人的大姐，她说“很准”，那周玉明会看手相就确定是“名不虚传”了。

不只是为好奇心所驱使，而是被那种朋友之间相互关心命运前途的热切气氛所感染，我把左手伸到了周玉明的面前。

未曾想，她果真出语惊人，先下了断言：“你失聪！”

“是吗？”在场的朋友们急地要我印证。

“你不用回答，听我说。”周玉明充满自信，“因为你失聪，乐感不好，所以你不会跳舞。因为你缺乏自信，所以尽管你有许多被人邀请的机会，但你从不敢下海，跨进舞池一步。其实，就是这种缺乏自信的心理状态，对你的事业影响也很大，这几年你应该是有所作为，但一切平平。”

话刚开头，到了我该出发的时刻。我与航鹰同行，接着去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赴海南岛农垦系统的访问团，报到地点是市郊的白云山制药厂招待所。我多想听周玉明为我继续算下去呀，但，花城出版社派来送我和航鹰的小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只得就此打住了。

“你是耳朵不好吗？”去白云山的路上，航鹰问我。

“是。”我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车在郊外平坦的公路上奔驰，我的思绪，已经飞回数千里外我童年时生活的故乡武进了。

武进是苏南的鱼米之乡。据说在解放前，中小学校的数量曾列全国之冠，出了许多文人骚客。在我出生的石庄里，读书风气就很浓，几乎没有失学的孩子。当我实足年龄还不满五岁时，父母就把我送进了本村的小学。

上学，对农村孩子很富有吸引力。我的母校，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完小，又恰好坐落在四个自然乡的交叉点上。周围村庄的孩子也都到我们村上来上学，下了课，一起在天井里玩耍，可热闹啦！

那年月的农村小学，设备相当简陋。没有操场，也自然就没有一切球类活动。女孩子爱踢毽子，男孩子爱玩弹子球，都

是自备的。天冷的时候,就玩“轧脂油渣”,小伙伴们挨墙角一字排开,一声“一、二、三”,就都使劲儿往里挤,直挤得顶在墙角的同学嚷嚷吃不消了才罢手,以此达到取暖的目的。

在我们班上,个头最高、玩起来也最野的一个同学,叫蒋介石,他动不动就欺侮小同学。他比我大好几岁,加上他的名字与蒋介石仅一字之差,我从上学第一天起,对他就有几分怕。玩耍的时候,总有意躲开他。他的外号叫“蒋赖皮”。没想到你越是躲着他,他却越耍赖皮,非缠着要跟你一起玩。有天课间,他招呼我到天井里去玩,我没答理他,静坐在座位上看我的书。他生气了,竟对准我的右耳开了一“枪”。

那是他自制的小竹管枪,一扣竹蔑做的扳机,黄豆粒做的子弹就射出枪膛。平时,这种枪打人,只要不伤着眼睛,是不要紧的。未料他朝我右耳开的这一枪非同小可,真把我击中了。我只觉得耳鼓“轰”的一声响,吓懵了。

我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双手捂住了耳朵。当我意识到豆粒被打进了耳朵眼,就“哇哇”地哭了起来。

同学和老师闻声围拢过来,一个个都试图帮我把豆粒从耳朵眼里抠出来。谁知,慌乱中那豆粒越抠越往深处钻……

老师没收了“蒋赖皮”的“枪”和“子弹”,还用戒尺抽打他的手心,狠狠地当众煞了煞了他的威风。然后,把我护送回家。

父母对我横遭此祸是很心疼的。有句歇后语,叫“豆腐掉在灰堆里——拍不得,打不得。”那豆粒掉在了耳朵眼里,就更让人束手无策了。母亲抚摸着我的红肿的耳朵根,默默地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那时候,乡下没有医院,只有在中药铺里挂牌的郎中先生。我父亲曾在苏州的一家老字号药铺当过几年学徒,周围几

个小镇上的郎中先生，他都是认得的。于是，他一连带我去了好几个镇子，别说没有一个位郎中先生做过从耳朵眼里取豆粒的外科手术，就连做梦，他们也不曾想到，世界上竟会冒出这样的稀奇事来。

几个镇子跑下来，腿都跑细了，豆粒还是没有取出来。它仿佛是个不会说话的宝宝，把我的耳朵眼当作了暖被窝，睡得好香好香，连个身都不翻一翻。

“送他到李郎中那里去看看吧！”母亲同我父亲商量。

母亲说的李郎中，在几十里方圆内，他的医术是最高明的。因为他和我已故的伯父是师兄弟，所以和我们家很有交情，出诊路过我们村时，总来看望我祖母。尽管李郎中留给我的印象是挺可亲的，但当父亲要带我到他家去就诊时，我却偏不愿意去了。这是因为，每次去看郎中，都没有什么高招，无非是变换各种镊子，试图把豆粒从我耳朵眼里夹出来的而已。结果，非但没有夹动豆粒，却反而把我的耳壁触得生疼。我已经怕郎中了，怕那一把把蟹脚似的尖利的镊子……

临上路之前，我在房门背后躲了起来。父亲转前转后喊了我好多声，我都没有答应。后来，是祖母把我找到了，拽到我父亲跟前。我依然噤着嘴，不想去。父亲生气了，骂我：“没出息的东西！”顺手扇了我一记耳光。

这是父亲打我最重的一次。我脸庞上留下他的五个手指印，两天之后才隐退。祖母好难过，她掉的泪比我还要多。

后来，我还是顺从父亲，到李郎中家求医去了。父亲疼我，一去一回，大段路是他背着我走的。父子俩早出晚归，带回家来的，依然是失望。四乡里再找不出比李郎中更高明的大夫了，从李郎中那里扫兴而归，这无疑是等于宣判我的右耳没救